

《漢學研究》歷史類論著引用文獻 計量分析(2004-2009)

耿立群

摘要

《漢學研究》自1983年創刊迄今，已成為國內很重要的人文研究學報，亦為國際漢學界知名的學術期刊。本文係以引文分析的方法，針對《漢學研究》近六年（第22-27卷，2004-2009年）歷史類論著82篇之引用文獻4,293筆做計量分析，以一窺歷史學論文的引用習慣和特性，並進一步了解其研究概況與發展趨勢。

研究結果顯示，《漢學研究》近六年刊登之歷史類論文，皆附有很多附註和引用文獻，其中以古籍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專書。引用文獻以中文資料最多，中國大陸出版者居半。出版距今六至三十年的書刊被引用得最多，可見文獻老化速度十分緩慢。引用文獻主要集中於史學領域，雖參考利用的書刊種類相當廣泛分散，本文仍試圖找出最常被引用的期刊21種、圖書29種，和現代作者18位。至於自我引用，《漢學研究》期刊本身的自我引用並不明顯，而雖有近六成的論文有作者自我引用的現象，但引用筆數的比例很低。

關鍵詞 (Keywords): 《漢學研究》、歷史學、期刊論文、書目計量、引用文獻、引文分析
(Chinese Studies; Historical Studies; Journal Articles; Bibliometric Analysis; References; Citation Analysis)

耿立群：漢學研究中心聯絡組編輯；E-mail: lckeng@ncl.edu.tw

一、前言

從事學術研究，是專業知識不斷積累的過程，在大量閱讀他人的書刊論著後，有了自己的心得或發現，從而撰述發表。是以學術論著的內容固有新創之處，但也奠基於前人的學術累積，不太可能是憑空臆想所得。因此，學術論著中常會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或為自己的著作提供佐證，或提供背景讀物，或呈現相關研究工作的既有成就，或證實有關的數據和事實，或對前人研究成果加以承繼、借鑒，甚或提出修正、反駁和批判，或向讀者提供進一步的文獻線索等。^[1]何光國甚至認為一篇沒有「引用文獻」的文章，不能算是研究論文（research paper），只能算是漫談、隨筆，且論文水準的高低和引用文獻品質的優劣，具有非常密切的關係。^[2]

美國科學資訊研究所（Institut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簡稱ISI）自1961年開始相繼發行科學引用文獻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簡稱SCI）、社會科學引用文獻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簡稱SSCI）、藝術與人文學引用文獻索引（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簡稱A&HCI），受到學界的重視。臺灣近年來也在行政院國科會的主導下，分別建置了「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TSSCI）和「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THCI）。中國大陸方面則以中國科學院建立的「中國科學引文索引」（CSCI），和南京大學負責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最具規模。^[3]由以上諸多引文索引的建置，可見學術論著中的引用文獻，被視為重要的參考指標，故值得花費心力去蒐集整理分析。事實上，上述各引文索引，除供檢索、研究外，常被據以評估各學者、期刊、大學院校、學術機構之學術表現，做為評鑑學術成果的量化指標。

臺灣以書目計量的方式，探討引用文獻的論著為數不少，然就歷史學科而言，此種研究方法似尚未見多所採用。近年來固有一些學者以量化的方式探究歷史學的研究趨勢，其中尤以彭明輝針對1945-2000年之期刊或學位論文所發表的

^[1] 何光國，《文獻計量學導論》（臺北：三民書局，1994），〈第4章 引用文獻分析〉，頁182-183。孟連生，〈試論引文索引法的性質與功能〉，《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3：1（1996.9），頁17。

^[2] 何光國，《文獻計量學導論》（臺北：三民書局，1994），〈第4章 引用文獻分析〉，頁179-180。

^[3] 陳光華，《引文索引之建置與應用》（臺北：文華圖書館管理公司，2006），頁29-35，51-63，70-74。

一系列論文^[4]，最為顯著。但彭氏的研究並未涉及論文中引用文獻的分析。本文擬以《漢學研究》近六年的歷史類論著中的引用文獻為材料，試圖從文獻計量的方法，一窺歷史學科期刊論文的引用特性。

《漢學研究》創刊於1983年，是臺灣很重要的人文研究學報^[5]，亦為國際漢學界知名的學術期刊。其內容包含中國文學、歷史、哲學等研究範疇。筆者前曾發表〈《漢學研究》二十五年來的回顧與展望〉一文，就該刊物之簡史、編輯概況、篇目主題分布、投稿數量與用退稿比率、作者來源和身分、得獎紀錄等略作敘述。^[6]並曾針對《漢學研究》自創刊號迄第26卷（1983-2008年）刊載之歷史類論文，分析其研究主題、作者性別與地區、語文、引用型態，及圖表利用等^[7]，現擬進一步就其歷史類論文的引用文獻進行深化的分析研究。

由於《漢學研究》自第22卷（2004年）起，在編輯體例的調整下，每篇論文的文末都附有「引用書目」，分為「傳統文獻」和「近人論著」兩部分。本文即以引文分析的方式，擇取《漢學研究》第22-27卷（2004-2009年）所刊載歷史類論著，根據各篇論文的「引用書目」，以觀察近六年來歷史類論著的引用文獻特性，希望能從外部探索歷史學科的研究概況。由於研究樣本只是一種期刊（《漢學研究》）中的論文，且各篇論文的作者很多來自海外，或不足以完全反映臺灣歷史學門的現象；不過一葉知秋，希望仍能有一些參考價值。至於《漢學研究》中文學、哲學等其他學門，或其他重要文史期刊，限於時間與篇幅，留待他日進行。

^[4] 彭明輝對歷史學期刊論文和博碩士論文之量化分析，約發表了近十篇論文，包括：彭明輝，〈從歷史學期刊論文分析臺灣史學研究動向（1945-2000）〉，《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9（2002.5），頁335-363；彭明輝，〈臺灣地區歷史研究所博、碩士論文取向：一個計量史學的分析（1945-2000）〉，收入氏著，《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1），頁151-205；彭明輝，〈臺灣地區歷史學期刊論文與博、碩士論文的量化比較（1945-2000）〉，《漢學研究通訊》，21：2（2002.5），頁1-15……等。

^[5] 《漢學研究》曾於2000-2004年連續五年榮獲行政院國科會「獎助國內學術研究優良期刊獎」（該獎項自2005年起停辦）；在國科會歷次中文、歷史、哲學等學門期刊評比排序中，亦皆名列前茅。

^[6] 耿立群，〈《漢學研究》二十五年來的回顧與展望〉，《漢學研究通訊》，27：1（2008.2），頁25-31。

^[7] 耿立群，〈《漢學研究》歷史類論文計量分析〉，《國家圖書館館刊》，99：1（2010.6），頁149-176。

二、文獻探討

本文主要利用書目計量的方法進行研究，書目計量可謂文獻計量學的一種，所謂「文獻計量學」，何光國曾如此定義：「凡利用數學、統計學、和邏輯學的理論和方法，對各類型文獻的本質和結構，作數量、品質、和運用上的研究與分析者，通稱為文獻計量學。」^[8]針對學術論著中的引用文獻加以分析，即所謂引文分析（citation analysis），是文獻計量學中重要的研究領域，主要是探討來源文獻與被引用文獻的關係，研究者可以由此了解某學科領域的發展現況、學科領域內文獻使用的特性、彼此間的關聯性，以及學科領域研究的未來發展趨勢等。^[9]近年來不少圖書館學者利用書目計量學來研究某學科領域的發展及其研究動態。^[10]

與本文藉由期刊論文的引用文獻，探討歷史學概況與發展最為相關的著作，是崔燕慧1997年的碩士論文「臺灣地區近五年文史哲期刊論文引用文獻分析」^[11]，她針對臺灣地區出版83種文史哲期刊，於1990-1994年所刊載的學術論文抽樣出346篇加以分析。除分析文史哲期刊出版特性、期刊論文主題分類與研究趨勢外，重點在於引用文獻分析，她就15,261筆引用文獻分析的結果是，大多數文史哲期刊論文均有引用文獻；文史哲研究者大量引用專書，高度引用古籍與原著，期刊論文相對較少；引用的文獻以本國語文為主，大陸地區出版文獻引用量大；引用文獻出版年代分布長遠，古今文獻均需使用；引用文獻所屬學科領域以文史哲學科為主。

性質較近的還有方美芬的〈1979-2002年中國大陸閩粵地區發表臺灣文學論文文獻計量分析〉^[12]，她就1979-2002年中國大陸閩粵地區出版的40種學術期刊上登載的615篇臺灣文學相關論文，除做書目計量分析外，並以這些論文中

^[8] 何光國，《文獻計量學導論》（臺北：三民書局，1994），頁8。

^[9] 陳光華，〈引文索引與臺灣學術期刊之經營〉，《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0：3（2009.6），頁69。

^[10] 例證詳見崔燕慧，「臺灣地區近五年文史哲期刊論文引用文獻分析」（臺北：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論文，1997），頁22-38；林巧敏，〈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論著之計量分析〉，《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51（1993.12），頁108-109。

^[11] 崔燕慧，「臺灣地區近五年文史哲期刊論文引用文獻分析」（臺北：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論文，1997）。

^[12] 方美芬，〈1979-2002年中國大陸閩粵地區發表臺灣文學論文文獻計量分析〉，《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報》，74（2005），頁261-276。

的3,546筆引用文獻做分析，結果大致為：平均每篇論文引用5.77筆文獻；引用文獻年代集中於1975-1999年，文獻老化現象不明顯；資料類型以圖書居首（占66.50%），期刊次之（占23.01%）；引用文獻的學科領域涉及很廣，但以文學類為主（占77.44%）；著錄格式只有51.38%是完整的，尙未臻學術期刊應有的標準。

就單一期刊之論文做計量分析者，包括林巧敏的〈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論著之計量分析〉^[13]，王國聰的〈我國近六年來「教學科技與媒體」期刊論文及其引用文獻分析〉^[14]，廖清海等的〈2002至2006年體育學報論文引用文獻計量分析〉^[15]，等多篇論文，本文在方法上做了一些參考。

三、研究問題與執行方法

本文係分析近六年刊登於《漢學研究》之歷史類論文所引用的文獻特質，亦即研究對象限定為《漢學研究》第22-27卷（2004-2009年）共16期的內容中^[16]，所刊載歷史類的研究論文。研究步驟是先將這16期刊登的211篇研究性論文（不計書評）中，析出歷史類論文共計82篇，然後將各篇文末的「引用書目」計4,310條，作為本文分析之對象。

逐筆檢視這4,310條引用書目，若有資料著錄不完整者，如缺出版地、出版年等，則查對補充之；或發現著錄有誤，亦做修訂。每篇論文的引用書目內容中，原則上以一本書（或一篇論文）算做一筆，如遇下列狀況則做條目之增刪：

（一）一本書（或一篇論文）分上、下出版刊登者，只算一筆。

（二）個人論集中引用二篇以上的論文，只算第一筆。例如27卷4期陳永明論文的「引用書目」中有謝正光的〈探論清初詩文對錢謙益評價之轉變〉和〈清初貳臣曹溶及其「遺民門客」〉二條，皆出自謝著《清初詩文與士人交游考》，遂刪除一條。

^[13] 林巧敏，〈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論著之計量分析〉，《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51（1993.12），頁107-118。

^[14] 王國聰，〈我國近六年來「教學科技與媒體」期刊論文及其引用文獻分析〉，《大學圖書館》，2：3（1998.7），頁127-151。

^[15] 廖清海、連振杰、蔡靜汶，〈2002至2006年體育學報論文引用文獻計量分析〉，《體育學報》，41：1（2008.3），頁85-98。

^[16] 《漢學研究》自創刊至第25卷（2007年）係半年刊，第26卷（2008年）起改為季刊，故第22-25卷共計8期，第26-27卷亦為8期，總計16期。

(三) 外文書有中譯本，且皆參用又著錄完整者，算二筆。例如27卷1期黃毓棟論文的「引用書目」中將Frank Dikötter,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及其中譯本：馮客著，《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放在同一條，且附註中係二者皆參引，故析出算二筆。

(四) 不同的古書雖收錄於叢書同一冊中，仍各自算一筆。如26卷2期劉文鎖論文的「引用書目」中，將收於《續修四庫全書》同一冊的《南漢叢錄》和《南漢文字略》置於同一條，析出算二筆。

經此增刪後，得有效條目4,293筆，以Excel建檔，本文即就此做分析。分析的項目包括這些引用文獻的數量、資料類型、學科領域、語文別、出版地、年代、最常被引用的期刊、圖書和作者，以及自我引用的情形等。

四、研究結果

本文針對《漢學研究》第22-27卷（2004-2009年）計16期的內容中，歷史類研究論文82篇的引用文獻計4,293筆，分析引用書目與附註之數量，引用文獻之資料類型、學科領域、語文別、出版地與出版年代，最常被引用的期刊、圖書和作者，以及自我引用的情形等。

(一) 引用書目與附註之數量分析

《漢學研究》自第22卷（2004年）起，在刊登體例上，每篇論文文末皆附「引用書目」，分「傳統文獻」和「近人論著」二部分，因此本文即以此進行引用文獻的分析。然而各篇論文仍有詳細的附註，或說明引用資料的出處，或做正文的補充。本文首先擬觀察附註和引用文獻之數量及其關係。（見表一）在近六年（2004-2009）所刊登82篇歷史類的論文中，每篇都有附註，合計有7,557條，平均每篇論文的附註數量高達92.2條，不但遠超過一般文史哲期刊的平均值^[17]，較諸《漢學研究》自創刊號以來的平均附註數量亦略有增加。^[18]82篇論文中附註最多的一篇是184條，最少的是19條。

^[17] 崔燕慧針對1990-1994年臺灣83種文史哲期刊取樣346篇所做的分析，扣除12篇無註釋的論文，平均每篇論文的註釋數是44.11條。見崔燕慧，「臺灣地區近五年文史哲期刊論文引用文獻分析」，頁61。

^[18] 《漢學研究》第1-26卷（1983-2008）所刊登歷史類有附註的論文400篇中，平均每篇有72.3個附註。見耿立群，〈《漢學研究》歷史類論文計量分析〉，《國家圖書館館刊》，99：1（2010.6），頁168。

表一：《漢學研究》附註和引用書目數量分析表

年度	論文	附註	平均附註	引用書目			有效引用文獻	平均引用文獻
				傳統文獻	近人論著	合計		
2004(22卷)	10	920	92.0	359	230	589	584	58.4
2005(23卷)	9	1,025	113.9	229	221	450	450	50.0
2006(24卷)	13	1,001	77.0	277	374	651	650	50.0
2007(25卷)	11	987	89.7	176	288	464	461	42.2
2008(26卷)	15	1,384	92.3	438	368	806	800	53.3
2009(27卷)	24	2,240	93.3	633	717	1,350	1,348	56.2
合計	82	7,557	92.2	2,112	2,198	4,310	4,293	52.4

引用書目中，「傳統文獻」指的是古籍、檔案等史料，「近人論著」則為現、當代人的研究論著。二者在這六年中互有領先，總計數量「近人論著」（有2,198條）略多於「傳統文獻」（有2,112條），兩者的比例為51.0%比49.0%，可見歷史類論著所徵引的文獻，古籍史料是相當重要的一環，約占總引用書目的一半數量。82篇論文中「引用書目」最多的一篇是129條，最少的是15條。經整理增刪後得出的有效引用文獻計4,293筆，平均每篇論文的引用文獻為52.4筆，亦超出一般期刊論文的平均引用數量甚多^[19]；可見每篇論文的產生皆需博覽群籍並旁徵博引；也反映《漢學研究》編輯體例之嚴謹。

以有效引用文獻與附註數量做比較，前者的總數為4,293筆，後者的總數為7,557條，引用文獻約為附註的56.8%，可見附註中有不少係重複引用，或解說性質以補充正文者，此類附註平均達四成以上。

（二）引用文獻之資料類型分析

本文將引用文獻的資料類型分為1. 古籍，2. 專書，3. 期刊，4. 學位論文，5. 論文集，6. 報紙，7. 會議論文，8. 電子資料，9. 檔案，10. 工具書，11. 研究報告等十一類。各類的內容與分類的原則擇要說明如下：

1. 「古籍」為1911年以前編撰出版的圖書，包括歷代的刻本、寫本、稿本

^[19] 崔燕慧針對1990-1994年臺灣83種文史哲期刊取樣346篇所做的分析，有效引用文獻計6,432條，平均每篇論文引用文獻的數量是18.59條。見崔燕慧，「臺灣地區近五年文史哲期刊論文引用文獻分析」，頁61。林巧敏對1954-1993年《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所做的統計，平均每篇文章引用文獻量為11.70篇。見林巧敏，〈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論著之計量分析〉，頁112。1992-1997年《教學科技與媒體》平均每篇論文有17.66篇引用文獻，見王國聰，〈我國近六年來「教學科技與媒體」期刊論文及其引用文獻分析〉，頁137。2002-2006年《體育學報》平均每篇論文引用文獻篇數為19.8篇，見廖清海、連振杰、蔡靜汶，〈2002至2006年體育學報論文引用文獻計量分析〉，頁89。由以上諸例，對比《漢學研究》的52.4筆，可見數量之懸殊。

等，以及1911年以後影印、排印出版的古書，如《四部叢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等^[20]，包含今人標點本、點校本。準此，西洋或東亞1911年以前的出版圖書，亦歸類為古籍。

2. 「專書」為以圖書形式出版者，包含撰著、編著和譯著。個人論集縱使只引其中單篇論文，亦歸為專書計算。今人所做的史料彙編，或今人譯注、校釋的古籍，都視為專書處理。^[21]
3. 「期刊」係指定期出版刊物內所刊載的論文。中國大陸因期刊統一刊號取得不易，有些期刊以叢刊的形式（第x輯）發行，只要刊期在年刊以內且定期出版者，本文皆歸為期刊類。若一篇論文著錄了二個出處（如先在期刊發表，後又收錄於某論文集），以最早刊行者為主。
4. 「論文集」為正式出版，內容係由不同作者之單篇論文所組成者，如研討會論文集、祝壽、榮退論文集等。今人所著單篇論文收錄於古籍重印本內，亦算是論文集。
5. 會議論文為在研討會中宣讀但未正式出版的論文；他人研究報告內所附的論文亦歸於此類。
6. 檔案包括古文書，皆係未出版者。檔案已彙集成書者歸於專書類。
7. 工具書包括書目、索引、字辭典、百科全書、年鑑、名錄、手冊、年表等。^[22]

分析結果顯示，《漢學研究》近六年歷史類論文的引用文獻中，以古籍類所占比例最高（44.33%），其次是專書（30.84%），二者合計占了總引用數量的四分之三（75.17%）；第三是期刊，占15.96%，三者合計比例高達九成（91.13%）。其他各類型資料所占比例皆很少，依序為：論文集（5.38%）、學

^[20] 有關古籍的定義，以1911年為劃分年代，係參考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合編，《圖書館古籍編目》（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2。許逸民，〈「古籍整理圖書」應該如何區分類別〉，收入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古籍編輯工作漫談》（濟南：齊魯書社，2003），頁194。

^[21] 今人係指民國時期的人，亦即彙編、譯注、校釋等係於1911年以後從事者。

^[22] 工具書的定義參見王錫璋謂：「所謂的參考工具書，一般而言，包括書目、索引、字辭典、百科全書、年鑑、指南、名錄、手冊、傳記資料、地理資料、法規、統計、政府出版品等，它們的特點都是以查詢為目的，而非全篇閱覽」，見王錫璋，《參考工具書的利用》（臺北：國家圖書館，1999），頁10。本文僅將傳記資料中的年表視為工具書，地理資料、法規、統計和政府出版品皆未歸入工具書計算。

位論文（1.33%）、工具書（1.12%）、檔案（0.56%）、會議論文（0.19%）、電子資料（0.14%）、報紙（0.12%）、研究報告（0.05%）。（見表二）

表二：引用文獻資料類型分析表

資料類型		引用數量		百分比%		排名
古籍	原刊本	1,903	113	44.33%	2.63%(5.9%)	1
	影印出版本		1,471		34.27%(77.3%)	
	標點本		319		7.43%(16.8%)	
專書	一般	1,324	1,153	30.84%	26.86%(87.1%)	2
	史料彙編		69		1.61%(5.2%)	
	譯注古籍		102		2.38%(7.7%)	
期刊 ^[23]		685		15.96%		3
學位論文		57		1.33%		5
論文集		231		5.38%		4
報紙		5		0.12%		10
會議論文		8		0.19%		8
電子資料		6		0.14%		9
檔案		24		0.56%		7
工具書		48		1.12%		6
研究報告		2		0.05%		11
總計		4,293		100.00%		

由歷史類論著所引用的文獻，古籍類居首位（占44.33%），可見該學科需要參考利用大量的原始典籍。我們若再細分資料類型，將專書中今人所做的史料彙編（占1.61%），和今人譯注、校釋的古籍（占2.38%）併入計算，則引用文獻中約有一半（48.32%）係屬徵引原典史料，以為立論的依據。這與上節所示「傳統文獻」占引用書目的49.0%，是若合符節的。文史哲學科的研究，大抵皆需參考利用古籍，崔燕慧針對1990-1994年臺灣文史哲期刊引用文獻所做的統計，古籍次於專書，占28.90%^[24]，相較之下，可說歷史學科比文學、哲學更為仰賴原典古籍的利用。

古籍部分在統計時，依其引用時所著錄的書目資料，將之細分為原刊本（即1911年以前刊刻的版本）、影印出版本（即1911年以後重印之古籍）及標點本（今人將古籍加上現代標點符號後印行），發現利用古籍時，以影印出版本居絕大多數（占77.3%），利用原刊本者只占古籍總數的5.9%，這一方面反映現代已將大量的古籍進行重印，另一方面則顯示利用資料時，以已出版、易於取得者

^[23] 引用文獻中有一篇單篇論文，僅著錄「此乃筆者在香港醫學博物館處影印，未載出處」，暫歸入「期刊」類做統計。

^[24] 崔燕慧，「臺灣地區近五年文史哲期刊論文引用文獻分析」，頁62-63。

優先利用。古籍標點本（7.43%）和譯注古籍（2.38%）為數不少，合計占總引用文獻的約十分之一，可見今人整理古籍成果斐然。

古籍之外，對於今人的研究成果，引用專書（占30.84%）居首，期刊（占15.96%）其次，引用量約為專書的一半。專書的利用超過期刊，似為文史哲學科的共同特點。依據崔燕慧的碩士論文，「文史哲研究者使用最多的資料類型是專書（47.20%），期刊的使用僅有專書的三分之一（15.27%）。」^[25]此與其他一些學科，以利用期刊論文為主^[26]，有很大的差異。

（三）引用文獻之學科領域分析

分析引用文獻所隸屬的學科領域，有助於我們了解此學科自我引用的情況，以及此學科與其他學科的相互關係。茲將《漢學研究》近六年歷史類論著的引用文獻，分為文學、史學、哲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五大類，觀察上述現象。在分類時，針對資料類型為古籍的部分，原則上傳統目錄學中的史部，歸入史學類；子部，歸入哲學類；集部，歸於文學類；經部則視其性質歸入上述三者之一。在統計學科領域時，注意到《漢學研究》歷史類論著中有大量古籍類型的引用文獻（占44.33%），恐不符一般對學科領域交互影響的取樣值，故列表時分別做了各學科領域總引用數量，和扣除古籍類引用數量的兩種統計。（見表三）

表三：引用文獻所屬學科領域分析表

學科領域	總引用數量	百分比%	古籍類數量	扣除古籍類數量	百分比%
文學	898	20.92%	666	232	9.71%
史學	2,761	64.31%	978	1,783	74.60%
哲學	432	10.06%	186	246	10.29%
社會科學	92	2.14%	13	79	3.31%
自然科學	110	2.56%	60	50	2.09%
合計	4,293	100.00%	1903	2,390	100.00%

^[25] 崔燕慧，「臺灣地區近五年文史哲期刊論文引用文獻分析」，頁63。

^[26] 例如圖書館學科，依據林巧敏對《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第1-50期所做的分析，以引用期刊最多，占44.89%，其次是圖書，占39.42%。見林巧敏，〈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論著之計量分析〉，《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51（1993.12），頁114。又如科技類的光觸媒，蔡明月等自SCIE(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資料庫1970-2003年的資料分析所得，謂「光觸媒文獻類型以期刊文章為主，其他類型較少。」見蔡明月、古育詩，〈光觸媒文獻之書目計量學研究〉，《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43：2（2005.12），頁158。而社會科學中的政治學，期刊論文也早已成為該學門發表研究成果的主要方式，因此各類評鑑學術單位研究產能的報告皆以「期刊著作」為測量的基準。見黃紀、湯京平、吳重禮，〈我國政治學系所期刊學術表現之研究：1995-2001〉，《臺灣政治學刊》，6（2002.12），頁56。

由表三所見，就各種資料類型的4,293筆全部引用文獻分析，屬於史學領域的引用的最多，計有2,761筆（占64.31%），其次是文學領域，有898筆（占20.92%），第三是哲學領域，有432筆（占10.06%）；三者合計比例高達95.29%，可見歷史類論文除引用史學文獻最多外，也大量參考利用文學、哲學的文獻。值得注意的是文學領域898筆引用文獻中，有666筆屬於古籍類型，絕大多數是古人的文集，可見利用文集做為史料，已是歷史學門普遍的現象。社會科學（占2.14%）和自然科學（占2.56%）領域引用得都很少，而自然科學略領先社會科學，是因為有科技史的論文，引用了不少古代的算疇、醫書、天文曆法等科學類的古籍（110筆中有約一半，60筆）。

若扣除1,903筆古籍類的引用文獻，僅以今人論著計2,390筆來計算，史學領域高達1,783筆，約占四分之三（74.60%），可見歷史學科自我引用的比例很高。其次是對哲學（占10.29%）、文學領域（占9.71%）的引用，約各占十分之一；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領域亦皆有引用，唯比例不高，各占3.31%和2.09%。可見歷史學科對同屬人文學科的哲學、文學領域有較高的關注和利用，亦即文學、史學、哲學三門學科有高度的關聯性，古稱「文史不分」，今日仍有其部分遺緒。至於引用其他社會、自然學科領域資料的情形則並不普遍。

（四）引用文獻之語文別分析

《漢學研究》近六年歷史類論著的引用文獻中，就語文別分析，統計結果顯示，所使用的語文有中文、英文、日文、韓文、德文、法文、俄文、蒙古文等。（見表四）以引用中文文獻為主，包含創作和譯作，比例高達85.06%，其次為英文文獻，占6.94%，日文文獻居第三，占5.57%；以次依序為韓文（占1.35%）、德文（占0.35%）、法文、俄文（皆占0.23%）、蒙古文（占0.21%）。其他類包括義大利文和羅馬拼音西拉雅語各一筆。引用文獻的語文別多達十種，可見其廣為參考利用各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和史料檔案。

表四：引用文獻語文別分析表

語文別	引用數量	百分比%	排名
中文	3,523	82.06%	1
中文翻譯他種語文	129	3.00%	
英文	298	6.94%	2
日文	239	5.57%	3
韓文	58	1.35%	4
德文	15	0.35%	5
法文	10	0.23%	6
俄文	10	0.23%	6
蒙古文	9	0.21%	8
其他	2	0.05%	9
合計	4,293	100.00%	

所引用的文獻以中文占絕大部分，說明對於中國歷史的研究主要依靠中文的古籍和論著。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將翻譯自他種語文的中文文獻析出分析，共計129筆，占總數的3.00%，所翻譯語文包括：英文、日文、韓文、蒙古文、法文、德文、義大利文、俄文、藏文、波斯文等，語文種類十分多元。可見做中國歷史研究，需要利用他國的文獻資料，而當有中文譯本，則基於閱讀的方便，以利用中文譯本為主。

至於外文引用文獻，以英文（占6.94%）和日文（占5.57%）為最多，顯示這兩種語文為《漢學研究》歷史類作者最為熟悉的外國語文，應也是臺灣最易取得的兩種外國語文。

（五）引用文獻之出版地與出版年代分析

在分析了引用文獻的語文別後，接著想了解這些文獻係於何處、何時出版。整理出版地和出版年代時，遵循以下之原則：

1. 出版地原則上以國家為單位做統計，但香港、澳門亦獨立做分析項目。中國大陸隨著時代政權之不同，另析出「大陸（民國時期）」（即1912-1949年出版者）和「大陸（清及以前）」（即1911年以前出版者）。臺灣亦將日治時期（1895-1945）析出。
2. 引用文獻中若同時著錄譯作和原作，以主要引用者，即著錄資料較完整者，記錄其出版地和出版年。
3. 專書分數冊出版者，若出版年不同，取最早之出版年；期刊論文分數期刊載者，亦取最早之出版年。
4. 出版社若著錄有二出版地，如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以主要或列在前面者做出版地統計；上例出版地為美國。期刊若有不同的發行地，以該篇論文刊載時所在的出版地記錄。
5. 引用古籍，依其著錄之出處為原則。亦即引用1911年以後影印、排印出版的古書，以重印的出版時地記錄。若引用原刊本古籍，且著錄有版本資料者，則以原書之出版時地記錄；若無版本資料，則以其所著錄之館藏地做為出版地記錄。
6. 檔案資料原則以其收藏之資料單位（如圖書館或檔案館）所在地為出版地記錄。

《漢學研究》近六年歷史類論著的引用文獻中，就出版地分析，統計結果顯

示，引用資料之出版國家或地區多達22個，其中亞洲包括臺灣、中國大陸、香港、澳門、日本、韓國、蒙古、印度、馬來西亞、黎巴嫩等10個；美洲有美國和加拿大2國；歐洲有英國、法國、德國、荷蘭、比利時、俄羅斯、瑞士、瑞典、義大利等9國；另有大洋洲的澳大利亞。（見表五）

表五：引用文獻出版地分析表

出版地		引用數量	百分比%	排名
亞洲	臺灣	1,304	30.38%	2
	臺灣（日治時期）	23	0.54%	
	中國大陸	2,089	48.66%	1
	大陸（民國時期）	99	2.31%	
	大陸（清及以前）	117	2.73%	
	香港	62	1.44%	5
	澳門	2	0.05%	14
	日本	241	5.61%	3
	韓國	44	1.02%	7
	蒙古	7	0.16%	12
印度	1	0.02%	16	
美洲	馬來西亞	1	0.02%	16
	黎巴嫩	1	0.02%	16
	美國	172	4.01%	4
	加拿大	1	0.02%	16
	歐洲	英國	60	1.40%
法國		10	0.23%	10
德國		21	0.49%	8
荷蘭		18	0.42%	9
比利時		1	0.02%	16
俄羅斯		10	0.23%	10
瑞士		1	0.02%	16
瑞典		1	0.02%	16
義大利		3	0.07%	13
大洋洲	澳大利亞	2	0.05%	14
出版地不詳		2	0.05%	—
合計		4,293	100.00%	

依表五所見，引用中國大陸出版的書刊為數最多，約占一半（48.66%，若加上民國時期占2.31%和清及以前占2.73%，則比例達53.70%），其次是臺灣，約占三成（30.38%，若加上日治時期占0.54%，則比例達30.92%），二者合計達八成以上。《漢學研究》近六年的歷史類論著，引用中國大陸出版的書刊數量超出臺灣的書刊，與崔燕慧1997年針對臺灣文史哲期刊所做的調查結果不同，她的統計係臺灣出版的出版品占49.08%，大陸的為27.55%，約為臺灣的一半。^[27]分析其相異的原因，第一，臺灣於2003年7月正式開放大陸簡體字學術書籍進口^[28]，於是大陸出版書刊在臺灣的銷售與取得，不論是個人或圖書館，都較前更為方便容易，這可能是造成近年來引用大陸書刊比例，較十多年前的統計大幅增加的最大原因。第二個可能的原因，是《漢學研究》刊登稿件的國際性較高，來自臺灣的稿件約只占總數的一半^[29]，與臺灣一般文史哲期刊大部分收錄本土稿件略有不同，相對地影響《漢學研究》引用臺灣的出版書刊比例較低。

中國大陸和臺灣之外，引用日本出版的書刊位居第三（有241筆），占5.61%，美國的排名第四（有172筆），占4.01%，香港第五（62筆，占1.44%），英國第六（60筆，占1.40%），韓國第七（44筆，占1.02%）；其餘各國數量均不多，皆不到1%。和語文別類似，以日本和美國為海峽兩岸之外引用文獻出版地最多的國家。

以下觀察《漢學研究》近六年歷史類論著引用文獻的出版年代，大致上以每五年為期，由近至遠做統計。1912-1949年因年代久遠，獨立為一期，不再細分，1911年以前出版的原刊本古籍亦然。另有些引用書目，未著錄出版年代，且查考不出，則列為「出版年代不詳」，其中絕大部分為未出版的檔案資料。（見表六）

^[27] 崔燕慧，「臺灣地區近五年文史哲期刊論文引用文獻分析」，頁64-65。

^[28] 2003年7月8日，行政院新聞局依據「大陸地區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進入臺灣地區或在臺灣地區發行銷售製作播映展覽觀摩許可辦法」規定，正式開放大陸地區大專專業學術簡體字版圖書來臺銷售。見曾堃賢、方芳美，〈民國九十二年圖書出版業大事記〉，鍾修賢總編輯，《出版年鑑2004年》（臺北：行政院新聞局，2004.8），頁202。

^[29] 依據筆者對《漢學研究》自創刊號至第26卷（1983-2008）歷史類論著所做的統計，作者來自臺灣的比例為47.7%，見耿立群，〈《漢學研究》歷史類論文計量分析〉，《國家圖書館館刊》，99：1（2010.6），頁165。分析本文第22-27卷歷史類82篇論著的83位作者（其中一篇二人合著），來自臺灣的有38人，占45.8%，餘依序為來自大陸25人，香港8人，美國、新加坡各3人，英國、日本各2人，韓國、加拿大各1人。

表六：引用文獻出版年代分析表

出版年代	引用數量	百分比%	排名
2009-2005	220	5.12%	6
2004-2000	696	16.21%	2
1999-1995	707	16.47%	1
1994-1990	501	11.67%	5
1989-1985	522	12.16%	4
1984-1980	563	13.11%	3
1979-1975	205	4.78%	7
1974-1970	163	3.80%	9
1969-1965	112	2.61%	12
1964-1960	107	2.49%	13
1959-1955	123	2.87%	11
1954-1950	24	0.56%	14
1949-1912	160	3.73%	10
1911以前	171	3.98%	8
出版年代不詳	19	0.44%	—
合計	4,293	100.00%	

由表六可見，引用文獻的出版年分布數量最多的二期是1995-1999年（占16.47%）和2000-2004年（占16.21%），亦即出版距今6-15年的書刊，是最常被引用的。其次的三期是1980-1984年（占13.11%）、1985-1989年（占12.16%）和1990-1994年（占11.67%），亦即出版距今16-30年的書刊，是次常被引用的。這連續的五期（1980-2004），即出版距今6-30年的二十五年間的書刊資料，合計約占七成（69.62%），構成了最主要引用年代的分布區塊。至於距今最近的一期（2005-2009）則緊接在後，排名第六，占5.12%。這樣的統計結果，顯示歷史類論著相較於其他學科，尤其科技類學科有明顯差異，後者講求引用較新的期刊論文等文獻，而對歷史學研究者而言，出版在30年內的書刊都具有高度的參考引用價值，也就是說其學說理論更新的速度較慢，也無追求引用最新（近五年）文獻的趨向。換言之，歷史學科較無文獻老化的現象。^[30]

不過出版超過三十年的文獻，則明顯地有引用數量下降的現象，且略呈遞減之勢。由表六可見，出版年代在1979年以前的各期，所占比例皆不到5%，1955-1979年這連續的五期，即出版距今31-55年的二十五年間，引用數量從

^[30] 所謂文獻老化，是指文獻資料逐漸失去其原有價值，而不再為人使用的過程。參見蔡明月，《資訊計量學與文獻特性》（臺北：國立編譯館，2003），〈第4章 文獻老化及其研究〉，頁106-135。

4.78%下滑至2.49%。而1950-1954年，引用數量更驟減至只有24筆，平均一年不到5筆（4.8筆），總比例亦僅0.56%。1912-1949年的情況也差不多，引用數量為160筆，平均一年為4.2筆。

至於1911年以前刊行的原刊本古籍，則仍佔有一席之地，達171筆，占3.98%，顯示今人整理重印的古籍，未能包括所有的古書，一些古籍還是得去圖書館查閱其原刊本。

（六）最常引用的期刊分析

在《漢學研究》近六年歷史類論著4,293筆引用文獻中，資料類型為期刊的引用文獻有684篇，大部分為中文，共541篇（占79.1%，其中13篇為譯作），其餘依序係日文77篇、英文57篇，德文、韓文各3篇，法文2篇、俄文1篇。這684篇期刊論文分布於332種不同的期刊中。依期刊被引用次數的多寡排列，整理如表七。

表七：期刊被引用次數的累積次數分布表

分區	期刊數 (A)	每一期刊被引用次數(B)	累積期刊數	A×B	累積引用次數
第一區	1	33	1	33	33
	1	23	2	23	56
	1	18	3	18	74
	2	16	5	32	106
	1	11	6	11	117
	1	10	7	10	127
	2	9	9	18	145
	7	7	16	49	194
	5	6	21	30	224
第二區	4	5	25	20	244
	12	4	37	48	292
	22	3	59	66	358
	53	2	112	106	464
第三區	220	1	332	220	684

在書目計量學領域，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布萊德福定律（Bradford's Law），是由英國圖書館學家布萊德福（Samuel C. Bradford）於1934年研究發現的，它大致的內容為：根據某學科各種期刊所含相關文獻篇數的多寡，依遞減次序排列，這些期刊可分為一個核心區（第一區）及接連的數區，且每一區包含大約相同的文獻篇數，則各區期刊種數的比例將呈現 $1 : n : n^2 \dots$ 的關係。^[31]

^[31] 參見何光國，《文獻計量學導論》，頁56。蔡明月，《資訊計量學與文獻特性》，頁143。

為檢視《漢學研究》近六年歷史類論著引用期刊是否符合布萊德福定律，在表七中係統計每一種期刊被引用的論文次數，並依其次數多寡遞減排序，計算其累積期刊數與累積引用次數，然後將期刊分成三區，每區含有大致等量的引用論文筆數。由表七所見，第一區共計21種期刊，每種期刊引用6至33筆論文，總計引用224筆論文，平均每種期刊引用10.7筆論文；第二區共計91種期刊，每種期刊引用2至5筆論文，總計引用240筆論文，平均每種期刊引用2.6筆論文；第三區共計220種期刊，每種期刊僅引用1筆論文，總計引用220筆論文。各區期刊種數的比例為21：91：220，若以1：4：4²之計算公式，應為20：80：320，則本文統計結果接近布萊德福定律的比值。

其中第一區的21種期刊，可視為《漢學研究》近六年歷史類論著引用文獻的核心期刊，亦即被引用六次以上者，茲臚列其刊名和引用次數，並查考其出版地、編印發行單位、創刊年和刊期，整理成表八如下：

表八：最常被引用的期刊一覽表

期刊刊名	出版地	編印發行單位	創刊年	刊期	引用次數
文物	中國大陸	文物出版社	1950	月刊	33
考古	中國大陸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55	月刊	23
中國史研究	中國大陸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1979	季刊	1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臺灣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28	季刊	16
漢學研究	臺灣	漢學研究中心	1983	半年刊→季刊	16
新史學	臺灣	新史學雜誌社	1990	季刊	11
清華學報	臺灣	國立清華大學	1956	半年刊→季刊	10
大陸雜誌(2002停刊)	臺灣	大陸雜誌社	1950	月刊	9
歷史研究	中國大陸	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	1954	雙月刊	9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臺灣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1991	半年刊	7
文史	中國大陸	中華書局	1962	不定期→季刊	7
東洋史研究	日本	京都大學東洋史研究會	1935	季刊	7
南瀛文獻	臺灣	臺南縣政府	1953	年刊	7
道家文化研究	中國大陸	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三聯書店	1992	不定期	7
臺大歷史學報	臺灣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	1974	半年刊	7
<i>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i>	美國	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1936	半年刊	7
中國哲學	中國大陸	三聯書店→人民出版社→岳麓書社→遼寧教育出版社	1979	不定期	6
中華文史論叢	中國大陸	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2	半年刊→季刊	6
北方文物	中國大陸	黑龍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	1985	季刊	6
國學研究	中國大陸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3	年刊→半年刊	6
燕京學報	中國大陸	北京大學燕京研究院	1995	年刊	6

在此21種核心期刊中，以現有刊期狀態統計，以季刊（8種）為最多，其次是半年刊（5種）。各期刊發行均有長遠的歷史，創刊最早的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迄今有八十二年的歷史，最「年輕」的是1995年復刊的《燕京學報》，亦有十五年的歷史了，這21種期刊迄今平均發行壽命為42.9年，可見歷史悠久、刊期較短的期刊，因產出論文篇數多，較有被引用的機會。

以出版地而言，中國大陸出版者有11種，臺灣出版者8種，日本、美國出版者各1種。中國大陸出版期刊之被引用數量超越臺灣，再次顯示《漢學研究》歷史類論著對中國大陸書刊的倚重，其原因已見上文「出版地」的分析。其中排名最高的《文物》和《考古》，均為月刊，文章產出量大；且皆創刊於1950年代，距今有五、六十年的悠久歷史；刊載文章多為考古發掘的報告，常被歷史學者當作史料來引用，上述三點應為其被引用次數最高的原因。其次的大陸期刊依序包括《中國史研究》、《歷史研究》、《文史》、《道家文化研究》、《中國哲學》、《中華文史論叢》、《北方文物》、《國學研究》、《燕京學報》。在中國大陸出版的11種核心期刊中，有《道家文化研究》、《中國哲學》、《國學研究》、《燕京學報》4種係尚未取得中國大陸期刊統一刊號而以叢刊形式發行者；《文史》亦長期如是，直到2002年才取得國內統一刊號，以上合計共5種，數量接近一半，是頗值得關注的現象。為什麼這些已發行多年而學界也普遍引用的刊物，不能得到大陸官方的認可承認其為期刊呢？中國大陸官方管控期刊的數量又是所為何來呢？

臺灣出版的8種期刊，《南瀛文獻》僅被單一篇論文引用了七次，故只能算是特例，難以由此證明其被高度利用。而其餘6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漢學研究》、《新史學》、《清華學報》、《中國文哲研究集刊》、《臺大歷史學報》）均為行政院國科會「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THCI Core）」，足見其普及性和重要性^[32]；《大陸雜誌》已於2002年停刊，但在其長達五十三年之發行期間，每月出刊（1971年以前更為半月刊），曾獲金鼎獎和教育部獎勵期刊^[33]，引用率高亦屬當然。

^[32]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漢學研究》、《清華學報》被列入綜合類，《新史學》、《臺大歷史學報》係歷史類，《中國文哲研究集刊》是文學類。見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網站2008年「THCI Core收錄期刊名單」，上網日期：2010.10.1。網址：http://www.hrc.ntu.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25&Itemid=425&lang=zw。

^[33] 《大陸雜誌》的基本資料和得獎紀錄，見國家圖書館網站「中華民國出版期刊指南」，上網日

《漢學研究》在各期刊中被引用之排名，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並列第四，雖屬名列前茅，但引用次數只有十六次，占期刊類型總引用文獻684篇的2.3%，期刊自我引用的現象應不明顯。^[34]這或許與歷史學門涵括內容廣泛，相關期刊很多，而《漢學研究》所刊載的論文包含中國文學、史學、哲學、語言學等各學門，不只是歷史學專門學刊有關。^[35]

日本京都大學東洋史研究會編印的《東洋史研究》和美國哈佛燕京學社出版的*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均為創刊於1930年代的老牌漢學學術期刊，論文品質甚高，頗具代表性，進入核心期刊實屬理所當然。

（七）最常引用的圖書分析

其次觀察圖書引用次數最高的是那些。計算時去除期刊、報紙、會議論文和檔案四種資料類型，共計3,571筆圖書型引用文獻，亦即包括專書、古籍、學位論文、論文集、電子資料、工具書和研究報告，皆納入統計。計算時不論其出版或版本資料，只要是相同的書名和作者，就算做是同一本書。統計這3,571筆圖書型引用文獻，發現以被引用一次的圖書數量最多（2,147種），占了六成（60.1%）；依次遞減，被引用二次的圖書有248種，被引用三次者61種，引用四次者22種，引用五次者17種，這顯示《漢學研究》歷史類論著需要引用參考的文獻範圍相當廣泛。以下茲將被引用六次以上的29種圖書，臚列如表九。

期：2010.10.1。網址：<http://readopac.ncl.edu.tw/nclJournal/guide.htm>。

^[34] 對比《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1-50期1,050筆期刊文獻，該刊被引用了126次之多，占12%，顯示該會報有自我引用的現象。見林巧敏，〈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論著之計量分析〉，頁116。

^[35] 分析期刊自我引用的情況，可以評鑑期刊在該學科領域的地位。若期刊的自我引用率高，表示該期刊的選稿具有連貫性，前後文銜接較好，成為指導某專業或課題的權威刊物；但自我引用率較高也可能代表著某期刊所刊載的文章專業領域較為狹窄，能互相交流的期刊較少。見蔡明月，〈圖書資訊學期刊自我引用分析〉，《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45：3（Spring 2008），頁304。並參考邱均平，《文獻計量學》（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8），頁343-344。

表九：最常被引用的圖書一覽表

書名	作者	引用次數
史記	(漢)司馬遷	23
後漢書	(南朝宋)范曄	19
漢書	(漢)班固	17
宋史	(元)脫脫	15
晉書	(唐)房玄齡	14
明史	(清)張廷玉	14
三國志	(晉)陳壽	12
朱子語類	(宋)朱熹著，黎靖德編	11
明儒學案	(明)黃宗羲	9
隋書	(唐)魏徵	8
通典	(唐)杜佑	8
新唐書	(宋)歐陽修、宋祁	8
周禮注疏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	8
唐會要	(宋)王溥	8
文獻通考	(元)馬端臨	8
宋會要輯稿	(清)徐松	8
荀子集解	(戰國)荀子著，(清)王先謙集解	7
舊唐書	(五代後晉)劉昫	7
清史稿	趙爾巽	7
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選譯	劉俊文編	7
禮記正義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	6
唐六典	(唐)李林甫	6
資治通鑑	(宋)司馬光	6
續資治通鑑長編	(宋)李燾	6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宋)李心傳	6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清)嚴可均	6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梁啟超	6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錢穆	6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錢穆	6

由表九所見，引用次數最多者為二十三次，所引用的係《史記》，太史公這部開創中國正史體例的鉅著，在中國歷史學上的地位和參考價值，果然非他書所能項背，且歷久不衰。而以《史記》為首的歷代正史，即《二十五史》中，有10種列名於表九清單中：《史記》、《後漢書》、《漢書》、《宋史》、《晉書》、《明史》、《三國志》、《隋書》、《新唐書》、《舊唐書》，且包辦前七名。其他被引用較多的書籍，亦多是歷代重要史籍（如《資治通鑑》）和經典（如《周禮注疏》），絕大多數屬於「傳統文獻」的範圍。「近人論著」只有劉俊文主編的《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選譯》、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的同名書和《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等4種，且多非近著。由此可

見歷史學門的引用文獻至多且廣，只有史料性質的權威經典古籍會較集中的被引用，近人論著則引用得非常分散。

(八) 最常引用的作者分析

以下分析引用文獻的作者時，擬排除古籍部分，觀察「近人論著」中，有那些作者是最常被引用的。進行的方法是：

1. 將資料類型為原刊本和影印出版本的「古籍」類書目刪除。
2. 資料類型為標點本「古籍」和譯注古籍類「專書」者，刪除其古籍的作者，只保留今人點校或譯注的作者。刪除後計有2,493筆文獻。
3. 再刪除引用書目中少數未注明作者的條目，多半是檔案類型的文獻資料，計31筆。
4. 一筆文獻中含有不只一位作者，如合著、合編，或有原著者和譯者，各種著作形態的作者均一一析出，列為統計項目；但出自論文集中的單篇論文，只計算其單篇論文的撰述作者，而不計該論文集的編輯者。如此共計有2,792筆作者姓名資料。

統計這2,792筆引用文獻的作者，其結果是以被引用一次的作者數量為最多（1,428人），占了約一半（51.1%）；依次遞減，被引用二次的作者有262人，被引用三次者有99人，引用四次者29人，引用五次者32人，引用六次者14人。由此可見《漢學研究》歷史類論著所引用參考的現代文獻作者亦頗眾多廣泛。以下茲將被引用七次以上的18位作者，臚列如表十。

表十：最常被引用的現代作者一覽表

作者姓名	作品被引用次數	作者姓名	作品被引用次數
錢穆	18	小島毅	8
余英時	18	王利器	8
Robert Van Gulik (高羅佩)	16	高明士	8
梁啟超	12	曹家齊	8
顧頡剛	12	Lynn Struve (司徒琳)	7
陳寅恪	11	孔凡禮	7
何冠彪	10	平田茂樹	7
孫衛國	10	余嘉錫	7
龔延明	9	黃一農	7

由表十所見，作品被引用十次以上者有8位，被引用七至九次者有10位。名單中包括二位西方人（高羅佩(Robert Van Gulik)係荷蘭漢學家，司徒琳(Lynn Struve)為美國歷史學者），二位日本人（小島毅和平田茂樹），可見外國學者的

作品，亦受到《漢學研究》歷史類論著的重視，有很高的引用。被引用次數最多的作者是錢穆和余英時這對師生，各十八次，二人皆為重要學者，且著作等身，無怪乎其作品被引用次數最高。值得注意的是，高羅佩的引用出現在同一篇論文中，較不能反映其普遍性。而孫衛國、曹家齊、平田茂樹、黃一農有自我引用的現象，孫衛國自我引用了八次（出現於2篇論文中），曹家齊七次，平田茂樹四次，黃一農三次。

以下擬觀察《漢學研究》近六年歷史類論著82篇中，作者自我引用的多寡。在82篇論文中，有48篇的作者引用了自己的著作，占總數的58.5%，接近六成。82篇論文有83位作者（有一篇係二人合著），其中49人有自我引用的情形，所引用的自我著作總數為119篇（種）。49人中以引用自己著作1篇（種）的作者最多，有17人次；引用自己著作2篇（種）的作者次多，有12人次；而引用自己著作的數量最多者為7篇（種），自我引用的作者平均每篇論文引用自己論著2.4篇（種）。實則所謂自我引用是指在一篇文章中，作者列於參考書目中有引用了自己的著作的篇數與全部參考文獻總數的比值。^[36]本文所有引用文獻總數為4,293筆，出自自我引用者計119筆，僅占2.8%。因此作者自我引用的現象，就本文的分析對象而言，是存在但比例不算高。

五、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漢學研究》近六年（22-27卷，2002-2009年）所刊載的歷史類論文82篇之引用文獻4,293筆做分析統計，簡要歸納研究結果如下：

一、《漢學研究》近六年歷史類論文，各篇皆附有為數頗多的附註和引用書目，平均每篇論文的附註數量為92.2條，引用文獻數量為54.3筆，可見撰述時需博覽群籍並旁徵博引，亦見該刊體例之嚴謹。引用文獻中「傳統文獻」和「近人論著」數量各半，可見歷史類論著所徵引的文獻，古籍史料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二、《漢學研究》近六年歷史類論文的引用文獻中，以古籍類所占比例最高（44.33%），其次是專書（30.84%），第三是期刊（15.96%）。引用專書比例

^[36] 此為「同時（synchronous）自我引用」的定義；另有「歷時（dischronous）自我引用」，則是指一篇文獻自發表以後歷年來被引用的總數中，作者自己引用自己文獻的次數所佔的比率。見 Stephen M. Lawani, "On the Heterogeneity and Classification of Author Self-Citat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33:5(1982.9), pp. 281-282. 轉引自蔡明月，〈引文索引與引文分析之探討〉，《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31：1（2005.4），頁50。

超過期刊論文，似為文史哲等人文學科的特性，與科技類或社會科學之引用文獻以期刊論文為主，有很大的不同。

三、古籍類型資料的引用，以現今重印之「影印出版本」居絕大多數，利用1911年以前刊刻的「原刊本」者只占古籍總數的5.9%，除反映現代已將大量的古籍進行重印，也顯示利用資料時，以已出版、易於取得者優先利用。古籍標點本和今人譯注古籍，合計占總引用文獻的約十分之一，可見今人整理古籍成果斐然。

四、分析所引用今人論著的學科領域，史學領域約占四分之三，可見歷史學科自我引用的比例很高。其次是對哲學、文學領域的引用，約各占十分之一，可見歷史學科對同屬人文學科的哲學、文學領域有較高的關注和利用；引用其他社會、自然學科領域資料的情形則並不普遍。

五、《漢學研究》近六年歷史類論著的引用文獻，所使用的語文多達10種，可見其廣為參考利用各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和史料檔案。其中以引用中文文獻為主（包含創作和譯作），比例高達85.06%；其次為英文文獻（占6.94%）和日文文獻（占5.57%）。

六、觀察《漢學研究》歷史類論文引用文獻的出版地，以中國大陸最多，約占一半，其次是臺灣，約占三成。出版年代的分布，以出版距今6-30年間的書刊資料引用得最多，合計約占七成，出版超過30年的文獻，才明顯出現引用數量下降的現象，顯示文獻老化的速度十分緩慢。

七、分析期刊類型的引用文獻684筆，計分布於332種不同的期刊中，依引用次數多寡計算，結果接近布萊德福定律的比值 $1:n:n^2$ 。被引用次數最高的期刊是《文物》、《考古》和《中國史研究》，皆為中國大陸出版；臺灣編印且被引用較多的期刊，多收於「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THCI Core）」。

八、計算圖書類型的引用文獻3,571筆，有六成僅被引用一次，可見參考利用的文獻種類相當廣泛分散。最常被引用的圖書絕大多數是歷代經典史籍，前三名是《史記》、《後漢書》和《漢書》。在被引用六次以上的29種圖書清單中，只有4種屬於「近人論著」，可見歷史學門的習於「引經據典」。

九、就現代作者的被引用率來分析，其作品僅被引用一次者居半，可見《漢學研究》歷史類論文廣泛引用各學者的書刊。被引用七次以上的18位作者，以錢穆和余英時排名最高；另包括西方人和日本人各2位——高羅佩（Robert van Gulik）、司徒琳（Lynn Struve）和小島毅、平田茂樹。

十、《漢學研究》自我引用的情形，就該刊本身而言，自我引用的現象並不明顯，此或由於歷史學門涵括內容廣泛，相關期刊很多，而《漢學研究》收錄尚包含中國文學、哲學等其他學門之論文。作者自我引用方面，有近六成的論文出現作者自我引用的情形，但自我引用的數量，僅占有所有引用文獻總數的2.8%，比例很低。

由以上對《漢學研究》近六年歷史類論著的引用文獻分析所得，可見歷史學門的論文，相當著重古籍的引用，古籍是研究的素材，也是立論的依據。因此古籍整理工作對歷史學者而言相當重要，重印、點校、乃至電子數位化，都有助於研究工作的進行。此外，專書的引用高於期刊論文，故在評鑑歷史學者的研究表現時，不宜比照其他學科，只注重期刊論文發表的篇數，經慢功細熬淬煉出版的專書，常更有學術價值。而由三十年內出版的論著都有很高的引用，可見歷史學門文獻老化的速度很慢，好的作品歷久彌新，長期有其參考價值，因此圖書館在館藏空間不足，要把部分圖書移往密集書庫或典藏倉儲時，不宜只考量出版年代，將老舊的圖書一古腦兒地移出，而應更細緻地顧慮到各學科的差異性。

參考文獻

- Lawani, Stephen M. "On the Heterogeneity and Classification of Author Self-Citat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33 : 5(1982.9), pp.281-284.
- 方美芬。〈1979-2002年中國大陸閩粵地區發表臺灣文學論文文獻計量分析〉，《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報》，74（2005），頁261-276。
- 王國聰。〈我國近六年來「教學科技與媒體」期刊論文及其引用文獻分析〉，《大學圖書館》，2：3（1998.7），頁127-151。
- 王錫璋。《參考工具書的利用》（臺北：國家圖書館，1999）。
- 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合編。《圖書館古籍編目》（北京：中華書局，1985）。
- 何光國。《文獻計量學導論》（臺北：三民書局，1994）。
- 林巧敏。〈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論著之計量分析〉，《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51（1993.12），頁107-118。
- 孟連生。〈試論引文索引法的性質與功能〉，《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3：1（1996.9），頁15-19。
- 邱均平。《文獻計量學》（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8）。
- 耿立群。〈《漢學研究》二十五年來的回顧與展望〉，《漢學研究通訊》，27：1

- (2008.2)，頁25-31。
- 耿立群。〈《漢學研究》歷史類論文計量分析〉，《國家圖書館館刊》，99：1（2010.6），頁149-176。
- 許逸民著。〈「古籍整理圖書」應該如何區分類別〉，收入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古籍編輯工作漫談》（濟南：齊魯書社，2003），頁191-228。
- 陳光華。《引文索引之建置與應用》（臺北：文華圖書館管理公司，2006）。
- 陳光華。〈引文索引與臺灣學術期刊之經營〉，《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0：3（2009.6），頁68-81。
- 崔燕慧。「臺灣地區近五年文史哲期刊論文引用文獻分析」（臺北：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論文，1997）。
- 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網站，2008年「THCI Core收錄期刊名單」。上網日期：2010.10.1。
網址：http://www.hrc.ntu.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25&Itemid=425&lang=zw。
- 國家圖書館網站，「中華民國出版期刊指南」。上網日期：2010.10.1。網址：<http://readopac.ncl.edu.tw/nclJournal/guide.htm>。
- 曾堃賢、方芳美著，鍾修賢總編輯。〈民國九十二年圖書出版業大事記〉，《出版年鑑2004年》（臺北：行政院新聞局，2004.8），頁197-208。
- 彭明輝。〈臺灣地區歷史研究所博、碩士論文取向：一個計量史學的分析（1945-2000）〉，收入氏著，《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1），頁151-205。
- 彭明輝。〈從歷史學期刊論文分析臺灣史學研究動向（1945-2000）〉，《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9（2002.5），頁335-363。
- 彭明輝。〈臺灣地區歷史學期刊論文與博、碩士論文的量化比較（1945-2000）〉，《漢學研究通訊》，21：2（2002.5），頁1-15。
- 黃紀、湯京平、吳重禮。〈我國政治學系所期刊學術表現之研究：1995-2001〉，《臺灣政治學刊》，6（2002.12），頁53-85。
- 廖清海、連振杰、蔡靜汶。〈2002至2006年體育學報論文引用文獻計量分析〉，《體育學報》，41：1（2008.3），頁85-98。
- 蔡明月。《資訊計量學與文獻特性》（臺北：國立編譯館，2003）。
- 蔡明月。〈引文索引與引文分析之探討〉，《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31：1（2005.4），頁45-53。
- 蔡明月、古育詩。〈光觸媒文獻之書目計量學研究〉，《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43：2（2005.12），頁153-172。
- 蔡明月、張美琪。〈圖書資訊學期刊自我引用分析〉，《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45：3（Spring 2008），頁303-329。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itations in History Articles Published in Chinese Studies between 2004 and 2009

Keng Li-chun

Abstract

First published in 1983, *Chinese Studies* has become not only an important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locally, but also an internationally-renowned sinological periodica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itations used in the past 6 years (volumes 22-27, 2004-2009) of history articles published in *Chinese Studie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4,293 different citations made in a total of 82 such articles offers an overall glimpse of the habits and features of citation use, and facilitate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nt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research carried out in the field of history in recent year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the history articles published in *Chinese Studies* during this period feature extensive notes and citations, the largest number of which refer to ancient works, followed by recent books. Most citations refer to materials in Chinese, with half of these published in mainland China. Books published between 6 and 30 years ago are most frequently cited, indicating that materials are passing out of use very slowly. Cited materials mainly focus on the historical studies field, and although a wide range of books are used for reference, this research attempts

Keywords (關鍵詞) : *Chinese Studies*, historical studies, journal articles, bibliometric analysis, references, citation analysis

Keng Li-chun : Editor of Liaison Divisio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 E-mail: lckeng@ncl.edu.tw

to identify the 21 most cited periodicals, 29 most cited books, and 18 most cited modern authors. Authors' citations of their own works are not at all clear in *Chinese Studies*, and although almost 60 percent of the works analyzed use self-citation, they represent a relatively low proportion of total citations.